

十九世纪波兰浪漫主义文学

〔丹〕勃兰兑斯著

成 时 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九八〇年·北京

Georg Brandes
THE ROMANTIC LITERATURE
OF POLAND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根据英译本 Poland, Study of Land, People And
Literature (W. Heinemann, London, 1904) 译出。

封面设计：鹿耀世

十九世纪波兰浪漫主义文学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〇二厂印刷

字数 107,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¹/₃₂ 印张 5

1980年4月北京第1版 1980年4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0,001—6,000

书号 10019·2940 定价 0.52 元

目 次

- 一 欧洲各国文学的共同倾向——特点——回顾
——科汉诺夫斯基——斯卡尔加——耶稣会
——法国哲学——理性主义1
- 二 波兰浪漫主义决定于民族性格，决定于欧洲
浪漫主义和政局——对于古典和浪漫的对立
的特殊观点——对拿破仑和拜伦的崇拜——
同莎士比亚和但丁的关系——流亡生活对作
家的情感的影响10
- 三 布罗津斯基，浪漫主义的先驱——民间谣曲
——乌克兰诗人：玛尔切夫斯基、扎莱斯基、
戈什琴斯基30
- 四 密茨凯维支和歌德——巴黎和《青春颂》——
密茨凯维支的青年时期——密茨凯维支和普
希金41
- 五 政治局面决定处理一切题材的方式，对于爱
和恨的观点，母亲的和子女的情感，个人与民
族、天才与周围世界以及情感与理智的关系，
对宗教和哲学的关系61
- 六 密茨凯维支、斯沃瓦茨基和克拉辛斯基三位
大诗人的两个首要主题：前两者，复仇的诗

人；后者，爱国的诗人	79
七 哈姆雷特性格在波兰——斯沃瓦茨基按照激进观点构思出的哈姆雷特类型以及克拉辛斯基按照保守观点构思出的哈姆雷特类型	100
八 《塔杜施先生》，本世纪仅有的史诗——密茨凯维支和热符斯基——密茨凯维支的重要作用	114
九 诗人之间的分裂——浪漫主义的解体——今天的波兰文学——批判性的总结	128
十 结束语	142
译后记	145

—

欧洲各国文学的共同倾向——特点——
回顾——科汉诺夫斯基——斯卡尔加
——耶稣会——法国哲学——理性主义

本世纪波兰文学展现的一幅图景和我所熟悉的其他欧洲文学相同，它的根本趋向正在改变。背景到处都是一样。本世纪开始时是一种陈腐的古典主义，不久即遭抛弃，一种浪漫主义风靡本世纪的大半个世纪，到了七十和八十年代则是曙光初露的现实主义。

这在欧洲是共同的。但是在每一个国家里，这些倾向又具有不同的性质，随它的历史理论和历史关系而定。本世纪的波兰文学除了那些起源于民族性的特点之外，还打上了一个与众不同的烙印，这就是：它是在一个作为独立国家最近已不复存在的国家中发展的。由于这个原因，文学，尤其是诗歌，取代了国家生活的所有职能，这些职能在国土被瓜分时失去了。这样一来，它在精神昂扬上便有所得，但也必然在多样化方面有所失。

为了了解本世纪的诗歌，必须对近几世纪的发展史作一简略的回顾。

宗教改革在主要的欧洲国家中引起了动乱。相形之下，波兰却不受侵扰^①。邻近的波希米亚，由于要求社会和宗教的大改革，在胡斯战争中耗尽了元气，从胡斯之死^②到白山之战

(1620)③,前后经过整整两个世纪,而在随后的两百年中,它不堪承担那些非常人所能忍受的努力,看来似乎从历史中消失了。比较起来,波兰的罗马天主教却没有受到多大攻击,这个国家也就没有受到任何宗教纷争的损害。

通常称为文艺复兴时代,对波兰来说,正是它的鼎盛时期,并给它带来了诗歌文学的第一个黄金时代。这一时代的最伟大的人物是扬·科汉诺夫斯基(1530—1584),一位贺拉斯和维吉尔的崇拜者,龙沙④的同时代人和相识。他初登文坛时是用拉

-
- ① 在十五、六世纪的波兰,罗马天主教会是最大的封建地主。波兰一部分贵族以及小贵族在争夺封建地租和政治影响上和天主教会发生冲突。贵族们便利用西欧、中欧相继爆发的宗教改革运动来作为反对教会的武器。然而这对贵族来说,只是权宜之计,而小贵族由于同农民也有根本矛盾,害怕群众参加斗争。一旦教会作出一些让步,他们便和它妥协,甚至转而维护天主教。因此,波希米亚的胡斯,德国的路德以及法国的加尔文先后发动的宗教改革在波兰只引起一时的微弱的反响,没有发展为群众性斗争。个别地方有过农民起义,但规模不大,很快就被镇压下去。
- ② 扬·胡斯(1370—1415),波希米亚宗教改革家。一四一五年,被康斯坦茨天主教议事会判为传布异端邪说,用火烧死。他的殉难引起捷克、摩拉维亚贵族和人民群众极大的愤怒。以后胡斯党人分成骑士、贵族、市民组成和主要由手工业者和农民组成的两派。在反对德皇的政治压迫和罗马教皇的宗教迫害的战争中,由于贵族和部分富有市民的背叛,代表手工业者和农民的塔波里特一派所坚持的武装斗争终告失败。
- ③ 一六一八年,捷克贵族发动了反对奥匈帝国哈布斯堡王朝的起义,开始三十年战争的捷克时期。贵族建立了临时政府,捷克再度摆脱了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但是贵族没有吸引人民群众参加战争,这次起义也就没有发展为真正的民族解放运动。最后,天主教联盟的军队利用新教徒的缺乏组织和相互疑忌,向捷克人进攻,在离布拉格不远的白山击溃了他们。起义终于失败。一六二一年六月,二十七名起义领袖被处死。
- ④ 贺拉斯(公元前65—8)和维吉尔(公元前70—19)都是罗马大诗人。比埃尔·龙沙(1524—1585)法国文艺复兴时代大诗人,著名的“七星诗社”的领袖。

丁文写作的诗人，但不久就用波兰文写诗，成为当时领袖群伦的大师。他充满了古代和文艺复兴的精神，对基督教冷淡而对共和国热情，是一个不信教的有神论者。他试作了各种体裁的诗歌，不论哪种体裁，都显得笔力雄健，胸怀阔大，富于人道精神。他为痛悼爱女之死而作的《哀歌》是一组质朴感人的佳作，其高超的程度，甚至在许多年以后维克多·雨果的同一题材的脍炙人口的诗作也仅能与之媲美。

盛行于这个时期的两种主要诗体是田园诗和讽刺诗——田园诗是由于有些诗人突破了独揽共和国一切的波兰贵族为自己划定的圈子而向受压制的平民靠拢，并在田园诗中对农人牧民加以赞颂；讽刺诗是因为另一些诗人的锋利的批判意识转向统治的贵族阶级，并对贵族地位是一种天缘巧合、由出身赋予的特权这种说法加以抨击。而正是在那个时候，在公元一六〇〇年间，波兰贵族对进步采取了肯定无疑的敌视态度，牢牢抱住他们的有权有势的特权地位不放。

当时的社会运动，在德国，随着农民叛乱的横遭镇压以及浸礼会教徒的惨遭灭绝而告摧折；在波兰，则在同哥萨克的战争中被贵族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打垮了。至于思想上的复兴，在德国，人文主义被路德教义所吸收，在世俗和宗教的中间形式的碌碌无为中停滞不前，然而它博大有力，足以长久抗拒时代的压力；在波兰，它一兴起就遭到阻遏，因为它和宗教改革运动不同，它被包含在一种只有教养和地位都处于最高层的阶级才能感应的人文主义中，因此，一当以耶稣会为首的宗教反革命对它发起攻击，它就被轻而易举地制服了。

波兰新教采取了一种离经叛道的哲学的形式，这种哲学拒绝接受教会的教义，同时也就不接受它的道德诫条，却又制订不

出任何独立的道德准则。它似乎主要是由一种论战的倾向和一种教条引起的，前者赞成一切早先遭到禁止的东西（血亲之间的婚姻以及自由放纵的两性关系）；后者认为没收教会的财产是必要的。但在同时，由于信奉新教的贵族需要宗教来约束平民，它本身的人文主义不能为群众所理解，又由于它为自己的特权提心吊胆，就必然害怕作为一切新教教义的根本，即自由探讨这一原则，因此，只要在贵族僧侣集团中出现几个卓有才华的人物进行鼓动，就足以使这些新教贵族偃旗息鼓，一个个回到天主教会的慈母怀抱中。奥热霍夫斯基（1513—1566）就是这样一位口若悬河的天才。他向贵族指明：只有僧侣能使国王战战兢兢，不敢违背自己的誓言；按照常例，国王要向贵族宣誓保证维护他们的特权。

奥热霍夫斯基的后继者是一位口才更加出众和出名的人物，耶稣会教士斯卡尔加（1536—1612），他是一位满腔热忱的波兰爱国者，没落的天主教的复兴者。他预见到贵族的无政府状态将会引起的种种危险。在向国会的一次布道中，他甚至预言波兰将被瓜分。让我们引他的一段话：

“一个国外的敌人将向你们扑来，将会利用你们的内部不和，它会说：‘你们的心灵已经趋于分裂，如今你们将要灭亡。’这些内讧将使你们沦于束手就缚的地位，在这种境遇中，你们的一切自由将会沦丧，将被践踏。曾经和国王联合在一起的大国和大公国或者自动离散，或者被人拉走。而你们，曾经一起统治过异族的你们，将如被遗弃的寡妇，成为敌人嘲笑或戏弄的对象。你们摧残了你们的人民、你们的语言。你们的民族是斯拉夫各民族中唯一自由的民族，你们毁灭了这个古老的声威远震的民族所遗留的一切，你们将会被憎恨你们的其他民族所吞

并。”(《第三布道书》)

玛泰伊科的一幅名画画的正是斯卡尔加向国会作这次布道的情景。

从斯卡尔加的时代起直到十八世纪中叶，耶稣会在波兰居于压倒优势，成为它的精神生活的主宰。索别斯基之所以在一六八三年向维也纳进军，与土耳其人交战^①，出于宗教的原因甚至多于政治的原因。维护天主教会的热忱促使波兰僧侣抬出耶稣会教团来，并且一步步地把全部宣教范围内的工作交到它的手里。在这样的统治下，最为时髦的智力的产物就是辩才，它在拉丁文中，同样也在波兰文中，发展到了非凡的高度。当时把两种语文夹杂在一起，形成一种不三不四的杂烩，只有那些附庸风雅的俗物才会点头赞赏。

耶稣会的运动最后被十八世纪法国哲学思想激起的潮流所瓦解。由于这些思想鼓吹政治方面的改革，它们只是在波兰国家出现了不可弥补的裂痕时才开始对人心有所影响。长久以来，保守的贵族阶级一直成功地把每一个改革企图加上反动的罪名——其实这是说，这种企图有损于他们的宝贵的个人自由，这种自由通过自由否决权^②造成了无政府状态和把王冠售给出价最高的买主的现象。于是波兰青年到法国去，为面临土崩瓦解

① 扬·索别斯基于一六八三年九月统率波兰军队与土耳其军队会战于维也纳，大败土军。不久他便当选为国王。

② 一五六九年，波兰和立陶宛的封建贵族在卢布林签订了联盟条约，联合成为波兰贵族共和国，建立共同的全波兰国会，并由国会选举国王。一五七三年，国会选举波兰西国王查理第九之弟亨利·瓦罗亚为波兰国王时，通过了所谓“亨利律令”，允许全部贵族参加国王的选举，国会决议必须经全部贵族代表一致同意。如有一个代表不同意，决议草案便被否决。这就是所谓“自由否决权”。

的威胁的祖国制订一部新宪法而求教于它的声名卓著的思想家。维耳霍尔斯基写信给《社会契约》的作者卢梭，从他那里得到了《波兰政体的我见》；他又写信给马布利教士^①，从他那里得到了《论波兰的政局》。这情形正如今天日本的使者请求柏林的格奈斯特教授^②为他们的国家制订一部宪法一样。

卢梭用一种纯属先验的方式考虑这个问题。他对专制政权的厌恶使他建议分散国家的权力，主张成立一个联邦政府，维持一个由选举产生的国王，甚至不妨碍保留自由否决权，只须对它的使用加以限制。他主张一种对波兰极不适合的民主形式；他的想法成为后来的无政府状态拥护者，即受俄国庇护的塔戈尔维茨联盟^③的卖国贼们的借口。马布利表现了较为高明的政治见识，主张建立一个世袭立宪君主制。

一七七二年，波兰第一次被瓜分，结束了这种和外国人士的磋商。但是一七七八年以后，民族主义党团的波兰人^④竭力活动，彼此商议，要创立一种新的政体，最后达成协议，通过了出色的一七九一年五月三日的宪法，这部宪法被称为波兰在欧洲国家中的贵族特许证。随之而来的是第二次瓜分，而在科希秋什

① 加布里埃尔·马布利(1709—1785)，著名的法国社会政治思想家，空想的平均共产主义的代表。

② 鲁道尔夫·格奈斯特(1846—1895)，德国政治家。

③ 一七九一年五月三日，波兰国会通过新宪法，取消王位选举和自由否决权，使波兰和立陶宛合并为一个国家，因而对波兰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削弱封建势力，在政治上经济上巩固波兰的地位有积极意义。反动贵族为了反对这部宪法，结成塔戈尔维茨联盟，向俄国求助。俄军便于一七九二年开入波兰，普鲁士随即进行武装干涉。两者帮助塔戈尔维茨叛国集团夺取了政权。波兰终于在一七九三年第二次被瓜分。

④ 在十八世纪后期波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发展的条件下，由小贵族和资产阶级组成的旨在实现他们的改良主义纲领的集团。

科^①起义以后又继之以第三次。

当时最卓越的人物之一是扬·希尼亚德茨基^②，唯理论的古典主义者的领袖。他对处于萌芽状态的浪漫主义的褊狭态度并没有排除他在其他方面的博大而明确的见解。他曾用下面的话恰当地表达了那个时代的情绪：波兰人在他们的祖国作为一个国家沦亡以后，感到自己犹如罪人一般，不得不压制乃至扑灭心中那些由教育、习惯以及那种想看到民众日趋安乐的愿望所产生的情感，这些情感曾是他们的智力和品格的核心。他还说：“如今，波兰人不得不忍辱偷生，不得不为自己造作一颗新的灵魂，而把他们的感情禁锢在狭窄得多的私生活的界限之内。”由此可见，在王国覆灭和新的浪漫主义文学运动来临之间，一般的精神发展出现了好几年的停顿状态，这是毫不足怪的。

就在这个停顿时期，发生了革命风潮以及拿破仑给欧洲局面带来一个大变化的情况。

在普拉加的大屠杀^③之后，征服者随即监禁了波兰的一些领袖人物，其中许多人消失在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堡垒里；另一些

① 塔杜施·科希秋什科(1746—1817)，十八世纪后期波兰民族解放运动的杰出领袖，出身于小贵族家庭，曾参加美国独立战争。他在一七九四年三月二十四日领导著名的克拉科夫起义。起义最初得到劳动群众的热烈响应，因而控制了华沙。但他在华沙发布的从小贵族利益出发而制订的改革法令，不能满足农民的要求。幻想破灭的农民脱离了这场斗争。起义在俄军镇压下失败了。科希秋什科本人在一七九四年十月在玛彻约维支一役中受伤被俘。一八一七年，他在流亡瑞士时死去。

② 扬·希尼亚德茨基(1756—1830)，波兰著名学者。曾任克拉科夫大学、维尔诺大学天文学教授，大学校长。克拉科夫天文台的创建人。

③ 普拉加是与华沙市区隔维斯杜拉河相对的一个小镇。俄军与波兰起义军在这里打了最后一仗(当时科希秋什科已被俘)。普拉加大屠杀大概是指这次战役中俄军对起义战士和平民的杀戮。

人被发配到西伯利亚，岂止如此，某些波兰将军还被远戍至堪察加。那些逃出魔掌的人则流亡到法国、意大利或土耳其。

由于他们的共和国在同三个世袭王朝^①的斗争中覆灭了，波兰人自然就在法兰西共和国进行的战争中对它表示同情。他们希望它能赞助他们的事业，因而他们的军团和法国部队并肩作战。共和国和波拿巴则一次又一次地欺骗了他们，辜负了他们的希望；拿破仑一次又一次向他们许下了他从来不想兑现的诺言；波兰人则一次又一次地成群结队为他流血沙场，岂止是成群结队，简直是成千上万。当他乘坐孤零零的一辆雪橇从俄国退却途中到了斯莫尔戈尼^②，有一百名波兰枪骑兵在黄昏时分自愿护送他，当时气温达摄氏零下三十度。第二天早晨，这些枪骑兵中只剩下三十六个。

科希秋什科不相信拿破仑，他以最坚定的态度拒绝劝导他的同胞在拿破仑麾下作战。奥特朗托公爵^③以谈判者的身分问他：“如果用武力强迫你这样做呢？”“那我就明白而响亮地宣告：我已失去了自由，我的同情并不在你们这一边。”对此，福煦的回答是：“好，我们没有你也行。”在一定程度上，这倒是实话，因为波兰人对这样一种想法着了迷。他们想：拿破仑是新皇朝的创立者，他将不得不同那些瓜分波兰的旧皇室作战。话虽如此，在远征俄国以前，拿破仑还是不以耻地盗用科希秋什科的名义，发布了一篇致波兰人的文告，在文告中，他使科希秋什科以不胜仰慕的感情谈到他自己。文告是这样开始的：“在震撼着波兰的枪炮声中，科希秋什科向你们讲话。今天这一切都出自拿破仑

① 指俄、普、奥三个帝国。

② 白俄罗斯的一个小城。

③ 奥特朗托公爵，即约瑟夫·福煦（1763—1820），拿破仑手下的警察总监。

的崇高的旨意，他废立各国君主，他象轰雷掣电般打垮敌国……这个代表命运的伟人正把目光转向你们，眷念着你们。”

在所有场合中，拿破仑总是利用、牺牲和欺骗波兰。但是这个民族自从国家沦亡以来，似乎注定要抱着毫无希望的希望，他们并不因此而抛弃他。正好相反，这位皇帝一倒，波兰立刻掀起了一股拿破仑崇拜狂（这一点我们以后还要谈及），相形之下，其他国家和其他文学中的拿破仑崇拜狂简直就不足道了。

亚历山大一世在他登基初期对波兰的态度是温和的。在从颁布开明的一八一五年宪章到亚历山大开始实行反动政策之间这段短时间里，精神世界发展得顺畅而自由，没有政治斗争来扰乱它。在这个时期，斯坦尼斯拉夫·奥古斯特^①时代的法国古典主义式的作品已被认为不过是客厅文学而不加一顾了。在波兰也象在其他地方一样，古典主义者同浪漫主义者有过一番斗争，不过为时甚暂；然后是各省的一群群新诗人相继登场，最初是乌克兰，随后是立陶宛，然后是其他各省。他们无不深切地感觉到：现在是走出那些空气窒热、奢华富丽的房间去接触辽阔天空下的人民大众的时候了。

① 斯坦尼斯拉夫·奥古斯特(1732—1798)，一七六四至一七九五年间的波兰国王。

二

波兰浪漫主义决定于民族性格，决定于欧洲浪漫主义和政局——对于古典和浪漫的对立的特殊观点——对拿破仑和拜伦的崇拜——同莎士比亚和但丁的关系——流亡生活对作家的情感的影响

对[波兰]①诗歌说来，一八二〇至一八五〇年这一时期是最为丰富多采和最重要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民族性格、欧洲浪漫主义和异乎寻常的政治局面显然是决定这一文学的三个基本因素。

发展到这时候的民族性格是和浪漫主义的种种影响特别合拍的。这民族性格是资质聪明，气度恢弘，崇尚豪华，富于幻想，以及倾向于骑士品德和追求宗教理想。当时正如现在一样，它缺乏日耳曼各族天生的冷漠以及拉丁各族天生的理智中所具有的稳定性。它近乎法国人的变化无常，而在变化的性质上又有所不同；法国人是在他们的唯理性是从的天性引导他们去粉碎自己的历史传统的时候显得多变，而波兰人则是随性情和兴致而转移。它近乎意大利人的偶像崇拜和生性活泼，但是它缺少精明的政治头脑，也缺少那种随机应变的本领，后者使意大利人

① 方括弧内的字句是译者所加的。

在任何宗教下都是不信教的俗人，在这些方面它又有所不同。

欧洲浪漫主义传到这个国家的时候，它的遭遇和在德国不一样。在德国，它滋生在外省城市的非政治性的社团中，并和曾经支配着有思想的人的头脑的飘忽不定的理想主义、对社会的冷漠和对现实的憎恶结合在一起。它也不象在英国所遭遇的那样，在那里，它发现自己和英国人的根深蒂固的追求功利、讲究实际的成见直接相抵触；它在那里和古挪威人崇尚不屈不挠的独立、崇尚自由的个人对抗一切，甚至对抗祖国的倾向结合起来。它也不象在法国和意大利那样，在那里，一种迥异于浪漫主义的拉丁的和古典的素质，使它无法征服人们的理智的心灵，并把它限制在为时短暂的纯属艺术的陶醉的范围之内。

在波兰，民族性格和浪漫主义一拍即合，而共同的民族厄运更使人产生一种浪漫的偏向。因此，浪漫主义并不使各人的心灵在利己主义（例如在德国）或者在狂放不羁的独立（例如在英国）中孤立起来，而是把这些心灵联结在一起，形成一种幻想的同胞情谊。它也并不以对现实的厌恶为条件，而是以这样一种意识为条件，这就是祖国已是一种非现实的，一种必须信奉但又是肉眼所看不见的东西。最后一点，拉丁气质，即使在波兰比在其他非拉丁国家强烈，究竟不过是外国传来的东西；它并没有作认真的抵抗。

在这里，浪漫主义的热狂以一种比别处远为强大的力量扫除了一切障碍，在远为广大的范围内（因为波兰民族性格不是理性的，而是慷慨激昂到了荒唐的地步）传播，比别处远为彻底地和现实的时世境遇契合和谐（因为波兰的民族命运人人关注，一切梦想都围绕着它）。

如果我们把眼光转过来看看那些政治局面和波兰相仿佛的

国家和文学，那末，我们对这一特点便会认识得十分清楚。诚然，绝对雷同的情况无论在哪里也是找不到的，但是多少类似的例子则并不缺乏。

我们不妨看一看例如一八三〇年间兴起于比利时的佛兰芒文学。它以格调和瓦尔特·司各特^①的作品相仿的规模宏大的历史传奇小说来唤起弗兰德斯人的民族感情。亨德利克·康欣斯^②的小说《佛兰芒的雄狮》是其主要作品，它和热符斯基的《索柏利查的回忆》^③同属一类。佛兰芒文学以纯粹的抒情诗最为出色。然而它是一个秉性温和而不是感情奔放的民族的产物。它是着眼于凡夫俗子的文学，不象波兰文学是神思飞扬、感情激越的诗，它以自己的光华辉耀天际，自身则消失在云霞之中。

我们再看芬兰，它的诗人卢内贝格^④可和密茨凯维支相媲美。以一八一〇年争夺芬兰的战争为题材的《旗手斯塔尔斯的

① 瓦尔特·司各特(1771—1832)，英国著名小说家和诗人。一生写了大量历史小说，大多以苏格兰史实为题材，但带有传奇性质。司各特是英国浪漫主义作家中的前辈。

② 亨德利克·康欣斯(1812—1883)，比利时小说家、诗人。他的作品在佛兰芒文学中最早赢得全欧洲的重视。《佛兰芒的雄狮》(1838)描写比利时西北部布鲁日的市民反抗法国骑士的起义。

③ 亨利克·热符斯基(1791—1866)，波兰作家，出身大贵族，曾在帝俄驻华沙的总督巴斯凯维奇手下任要职，主张波兰的“复兴”在于和俄国合并。他的处女作也是成名作《塞维林·索柏利查的回忆》，由许多独立的故事组成，用索柏利查这个讲故事人回忆旧时轶事的方式，描绘和美化十八世纪波兰贵族的生活。

④ 约翰·路德维希·卢内贝格(1804—1877)，以瑞典文写作的芬兰大诗人。一八〇八至一八〇九年，俄国和瑞典进行争夺芬兰的战争。瑞典败后，把芬兰割让给俄国。卢内贝格的代表作《旗手斯塔尔斯的故事》包括许多抒情、叙事的诗篇以及仿民间谣曲的作品，都是以这次战争为题材，洋溢着反对沙俄的热情。

故事》无疑是欧洲文学中与《塔杜施先生》最为近似的作品。作者描绘在这次战争中表现出来的芬兰的民族性格，正如《塔杜施先生》形容同一时期波兰的民族性格一般。这两部诗作都没有民族仇恨。出现在这部芬兰组诗中只有一个俄国军官，库尔涅夫，他是高尚的敌人的一个典型，正直而温和；而在这部波兰史诗中出现的唯一俄国军官栗考夫则是一个高贵的人，忠诚、勇敢，出污泥而不染。

卢内贝格的诗作中缺少的是崇高的民族自我批评，而这是密茨凯维支，也是所有波兰诗人的特点。他笔下的芬兰人是英雄，“穿着冬装”的英雄，虽然有时衣衫褴褛，但始终是英雄。他们几乎没有缺点。波兰诗人尽管无限热爱他们的同胞，却要全面得多，既描写他们的民族承袭下来的性格上的弱点，也描写它的长处。当然，他们手头有着远为丰富的素材；波兰人是有一千年文明的光明面与黑暗面的民族，不象芬兰人那样是个不太发达的民族，他们的语言甚至完全缺乏文学的风姿和光彩。

波兰的特殊处境使我们在比较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时候所持的观点不得不有所改变。

密茨凯维支的诗作《浪漫主义》提出了这样的信条：民间迷信比古典的理性主义更有价值。我们读这一诗篇时，可以看到在迷信鬼魂的狂热以及对透过显微镜来观察的冷静的真知灼见的憎恶中，有一种各国的浪漫主义所共有的东西，不，简直是浪漫透顶的东西。浪漫主义者到处都自鸣得意地把新感情的汹涌澎湃的潮流引导到神灵信仰和民间迷信中去。文学中浪漫主义的出现到处都和十八世纪漠视一切教条在十九世纪激起的大规模的宗教反动有关。

话虽如此，有两点情况却赋予波兰的浪漫主义以特殊的性